

云南边境地区跨国人口流动研究述评¹

子志月，沈 彭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504)

【摘要】：地处中国西南边疆的云南省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跨国人口流动现象十分频繁，由此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通过对学界关于云南边境地区跨国人口流动形成的动因、类型与特点、社会影响以及管理对策等方面研究成果的梳理回顾，提出要重视和加强我国与东南亚邻国跨国流动人口有效管理的合作机制以及云南边境地区外籍特殊群体、外籍人员的社会文化适应和近年来云南边境地区出现的“回流边民”现象的调查研究，为党和政府进一步加强边境地区事务管理、维护边疆和谐稳定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云南；边境地区；跨国人口流动；前瞻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8)05-0069-07

跨国人口流动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国际经贸发展的必然结果之一。长期以来，地处中国西南边疆的云南省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边境地区跨国人口流动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从而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围绕边境地区跨国人口流动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讨论与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一、跨国人口流动的动因研究

人口流动是指一定数量的人类社会群体，在一定的空间范畴内所发生的运动现象。^[1]云南边境地区跨国人口流动主要是指从边境沿线两侧跨越中缅、中老、中越共有的边界而发生的流动，即云南与接壤国家之间发生的人口跨境流动。关于云南边境地区跨国人口流动的动因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历史文化因素

由于地理和历史等原因，云南与周边邻国的交往交流交融源远流长，其原因主要有：第一，族源与亲缘认同。卢鹏通过对中越边境地区的研究指出，长期以来，滇越边民以地缘为条件，以族缘、亲缘为纽带的跨国流动非常频繁。^[2]鲁刚提出，云南有16个跨境民族，相同或相近的历史、血缘、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尤其是共同的民族语言、民族心理使其相互之间保持着天然的联系和根深蒂固的相互认同感。^[3]民族文化认同使生活在边界两侧的族群形成了较强的彼此联结的团结感，边民往来频繁。^[4]周雷指出：“边民有明确的国家归属意识，但民族属性上的同亲同源，确实使大多数边民内心深处存在‘既是国家的又是民族的’二元身份认同，因而其在边境上的‘跨国往来’是一种融合了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天然生计选择。”^[5]第二，地缘优势。黄彩文指出：“由于江河同源，民族同根，中缅两国历史上形成的边境贸易、通婚互市、探亲访友、节日聚会等友好往来从未间断，边民之间保持着频繁的跨国流动。”^[6]第三，边民通婚。莫力认为由于民族同源、交往历史悠久、文化相通，云南边境普遍存在

¹【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6BMZ115)

【作者简介】：子志月(1972-)，女(彝族)，云南永胜人，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民族文化、民族档案学研究；沈彭(1993-)，女，山西晋中人，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文化研究。

的跨国婚姻是中国西南边境地区跨国人口流动的一个主要动因。^[7]鲁刚也指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云南边境地区跨境而居的民族有着根深蒂固的相互认同感,世代延续着通婚结亲等传统的交往关系。^[3]马健雄也指出由于边境两侧发展差距和边境性别比例失调而引发的“婚姻挤压”,引发了跨国婚姻人口流动现象。^[8]由此可见历史文化因素是造成云南边境地区跨国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动因。

(二) 经济因素

第一,流入地拉力与流出地的推力对边境地区边民的影响。“推拉理论”是人口学关于人口流动的动因方面最重要的理论,其核心观点是人口流动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因此,流入地的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成为推力。戴长征认为“经济因素是造成跨国人口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已成为推动跨国人口流动的强大动力”。^[9]第二,国际经济环境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张志伟在针对国际经济环境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中指出:“我国加入WTO以后,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将随之发生新的变化。从长期看,WTO提供的最惠国待遇原则有利于发挥我国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企业及第三产业的优势,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也是造成跨国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经济动因。”^[10]卢鹏指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跨国人口流动。”^[3]在此基础上张金鹏指出:“造成云南边境地区人口流动现象的动因首先是发展的差距。巨大的经济差异动力机制,促使云南边境地区境外人口向中国一侧流动。”^[11]第三,跨国劳工收入增加的影响。张家忠指出:“近年来受中缅边境云南段对外开放的深入、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量就业机会的增多和中国国内比缅甸高出多倍的劳动报酬等客观因素影响,经商务工成为跨国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动因。”^[12]黄彩文在对中缅边境地区外籍劳务人员的研究中指出:“中国边境普遍存在的外籍劳务人员群体是随着中国综合经济实力崛起、国际影响力增强而出现的一种新现象。”^[13]何跃认为,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周边地区开始出现以边境贸易的互相往来为起点的跨国人口流动,逐渐形成次区域性贸易和旅游文化为一体的跨国流动潮,也形成了不同的境外流动人口流动态势。^[14]由此可见,经济因素是造成云南边境地区跨国人口流动现象的另一个主要动因。

(三) 政治因素

第一,各国边境治理政策。作为地处国家之间的区域,边疆不仅接受本国的管理和建构,而且还受到国家之间关系以及相邻国家的影响。^[15]戴长征在对跨国人口流动原因的研究中指出,国家通过相关政策,尤其是民族政策对人口流动产生了影响。此外他认为国家的政治动荡影响着人口流动。^[9]第二,安全稳定的政治环境。梁淑英指出,一些国家内部由于政治动荡、自然灾害和经济落后等原因,百姓难以生存或生活极度贫困从而逃往异国他乡,加之一些人由于畏惧政治迫害而离开本国或经常居所国,非法进入或企图进入那些政治稳定、经济条件好的国家。^[16]白庆哲认为,人口迁移的政治动因主要包括军事征服和外部强权的介入、国家政策、政治变迁以及地区局势等因素,并强调地区局势发生变化对区内国家人口的流动有着重要的影响。^[17]鲁刚指出,缅北民族地方武装全部紧靠中缅边界沿线分布,有着特殊历史渊源和复杂的政治背景,是当前影响云南边境沿线地带社会状况的突出问题之一。^[3]针对这一问题,陆云在对中国西南边疆中缅边境地区非传统安全突出问题的分析中指出,缅甸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地方武装一直处于内战状态,矛盾一直未解。复杂的政治格局和缅甸战乱的国情致使许多边民向中国流动。^[18]政治乱局致境外边民流入国内。第三,流入国宽松的管理措施。卢鹏指出:“随着1991年中越两国关系的恢复,两国边民的流动也恢复正常。由于中方采取较为宽容的管理措施,越南边民流入我国边境村寨的情况较多。”^[3]可见,流入国宽松的管理措施也会增加边境地区跨国人口流动规模及人数。

通过对近年来学界对边境地区跨国人口流动研究的梳理发现,云南边境地区跨国人口流动是历史与现实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长期普遍存在的经济社会现象。

二、跨国人口流动的类型与特点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大量跨国流动人口在我国云南边境地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近年来学术界很多学者都

从不同的视角对云南边境地区的跨国人口流动做了类型划分，并对云南边境地区人口流动的特点做了研究总结。

（一）跨国人口流动的类型研究

陈德顺根据境外流动人口是否符合我国出入境管理法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从总体上将境外流动人口大致分为合法的跨国流动人口和非法流动人口两类。^[19]陈真波则根据人口流动的方向，将边境跨国人口流动分为外籍流动人口滞留我方以及我方流动人口滞留境外两种类型。^[20]在此基础上，鲁刚将中缅边境的人口流动现象大致分为商贸类跨国人口流动、旅游类跨国人口流动、劳务类跨国人口流动和探亲访友类跨国人口流动等类型。^[1]何跃根据在云南边境地区实地调查中所了解到的情况，将云南边境地区的跨国流动人口分为商贸型、季节型、跨文化交流型、跨界民族型和非法的“三非人口”几大类。^[21]黄彩文也提出在我国沿边地区大量的外籍流动人口中，外籍劳务人员是不可忽视的一类流动人口。^[13]长期以来，云南边境地区的跨国通婚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从而成为跨国人口流动的主要类型之一。不少学者围绕边境地区跨国通婚这一现象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何明将跨国人口流动分为经济性迁移、婚姻性迁移、宗教性迁移三种类型，并指出也有经济性迁移转化为婚姻性迁移的情况。^[22]王晓丹提出：“婚姻迁移是一种常见的人口迁移方式，它是基于自然性别关系和社会性别关系之上的社会人口流动，婚姻迁移在经济差距形成的推力和拉力中发生。在这种流动中女性往往是婚姻迁移的主体。”^[23]从跨国人口流动的类型看，不论是以商贸、旅游、劳务和探亲访友为目的，还是以婚姻、宗教为目的，跨国人口流动是边境地区长期存在的经济社会现象。

（二）跨国人口流动的特点研究

跨国人口流动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其流动在空间上至少跨越某两个主权国家共有的边界线。^[1]何跃指出，云南境内的境外流动人口逐年增多，且流向分布也向多元化发展，境外流动人口从单一国流动向多国化流动转化，从沿边境一线流动向云南境内纵深流动，境外流动人口的流向日趋复杂和多国化，境外流动人口的分布日趋广泛，且成分复杂，流动性强。^[21]基于云南边境地区特殊的地缘形态和社会环境，鲁刚指出跨境地区的人口流动问题有着十分鲜明的区域性地方特色，具有历史性、群众性、民族性的特点。同时，边境地区人口流动具有双向对流特征明显、人数众多流量大、动因复杂形式多样、来源纷繁结构庞杂以及空间分布不平衡等五大特征。^[1]卢鹏通过对滇越边境跨国人口流动的研究，将滇越边民跨国流动的特征概括为：族缘、亲缘是跨国流动的主要纽带，经济交往活动在跨国流动中日益增多，追逐经济利益成为边民跨国流动主要考虑的因素。^[3]陈德顺将边境地区跨国人口流动的特点总结为境外流动人员多从事边贸互市，其次为短期帮工、佣工、走亲访友等，大多数境外人员多是从事合法的商贸活动，以玉器、服装、食品等经营项目为主等。^[19]张家忠通过研究指出，中缅边境地区人口流动呈现出就业广、聚居集中、“三非”人口多、青壮年人口多等特点，其活动地域呈现出集中与散状分布并存的状态。^[24]此外，何明通过研究认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国家边民跨国流动经历了中国西南边民大规模向周边国家单向流动、中国西南与周边国家边民双向流动以及周边国家边民向中国边境地区单向流动三个阶段。^[22]总之，通过上述梳理发现，边境地区跨国人口流动从类型上可分为合法流动与非法流动；从流动目的来看，可分为商贸类、旅游类、劳务类、探亲访友类和婚姻迁徙。

三、边境地区跨国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云南边境地区近年来跨国人口流动现象日趋频繁，一方面对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中缅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边疆和谐稳定以及地方社会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

（一）边境地区跨国人口流动的积极影响研究

学界在围绕跨国人口流动问题开展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认为，跨国人口流动客观上对促进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何明认为，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的不断巩固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国家的边境族群跨国流动呈现出开放和谐与双赢互动的总体态势。^[22]首先，可以缓解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劳动力短

缺的问题。黄彩文指出,进入我国中缅边境地区的外籍务工人员有利于缓解边境地区劳动力短缺的现状,有利于推动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并巩固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而且有利于促进我国“一带一路”建设。^[13]张振伟通过对西双版纳勐龙镇缅籍劳工的跨境流动研究指出,相邻的地缘和相似的民族文化背景及差异性的经济发展方式造就了缅甸劳动力的跨境流动,在勐龙镇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劳动力分层之后,大量缅甸籍劳动力的跨境进入弥补了底层劳动力的缺失。^[25]其次,有助于深化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互信与友好往来。陈德顺指出,合法的跨国人口流动对于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商业繁荣和文化科技交流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它不仅活跃了边境贸易和双边文化交流,而且也有助于深化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互信与友好往来。^[19]黄彩文在对布朗族的研究中也指出,中缅两国布朗族之间频繁的探亲访友、通婚互市和文化交流等活动对促进边境地区的民族团结和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6]最后,有助于缓解边境地区婚姻挤压问题。张金鹏在基于对跨国婚姻的研究中指出,跨国婚姻的存在既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边疆地区和平、安定、睦邻友好社会环境的反映,是党和政府惠农、惠边政策以及“兴边富民”“新农村建设”实施给边疆地区带来巨大发展变化的积极反映,同时也是人口流动以及性别比例失调造成“婚姻挤压”的一种社会调适。^[11]李光灿还提出人口的流动扩大了边境地区的通婚圈,从遗传进化的观点来看,通婚圈的扩大,必然会扩大和加速人种基因的交流,这对于改善这些地区人口的身体素质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26]

(二) 跨国人口流动对边境地区的挑战研究

当然,跨国人口流动给云南边境地区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由于我国边境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非法的外籍人员,引发了一些显性的或隐性的非传统社会安全问题,给我国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带来了许多风险与挑战。

一是“三非”人口问题。云南边境地区跨国人口流动中,除了合法的商贸型、劳务型、探亲访友型等人口流动外,还有一部分非法的流动人口,他们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即我们所说的“三非”人员群体。云南边境地区“三非”人口的跨国流动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治安问题,给地方社会治理带来诸多挑战。杜彬指出,“三非”人员不仅违反了我国出入境管理法规,破坏了我国正常的出入境管理秩序,也给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和现实危害。^[27]李玉洁通过深入德宏边境地区的田野调查指出,“三非”外国人非法偷越国境破坏国境管理秩序,部分“三非”外国人从事贩毒、“两抢一盗”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秩序。^[28]吴喜认为,“三非”人员的危害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影响了出入境管理正常秩序,二是严重影响边境地区社会治安稳定,三是严重影响了边境地区人口管理工作。^[29]张爱华在对中缅边境地区跨境通婚问题的研究中指出,滇缅边境的非法居留人口严重扰乱了出入境秩序,使得公安派出所实有人口服务管理难以实现,并且严重影响到了边境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30]可以说,云南边境地区日趋严重的“三非”现象及其跨境违法犯罪问题,已经成为影响边境地区社会稳定的突出因素。^[31]因此,在治理“三非”问题上,应采取堵疏结合的综合治理对策,才能达到标本兼治。^[32]总之,加强云南边境地区“三非”人员治理,成为建构边疆治理体系、提升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二是毒品犯罪问题。不少学者从社会学和边疆治理等视角对云南边境地区的毒品问题展开了讨论。李光灿认为,吸毒贩毒问题与人口流动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流动数量的增加、流动空间的拓宽和人口流动频度的提高,境外的大毒枭们从云南边境向中国内地走私倾销毒品,致使我国毒品犯罪案件迅速上升。^[33]方天建指出,大量邻国跨界民族流动人口在云南沿边跨界民族地区的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也让跨界民族中的非法贩毒分子拥有了天然的社会流动庇护链条,进一步加剧了云南跨界民族毒品问题的复杂性和变动性。^[34]陆云认为,云南边境地区因毒品过境导致吸毒人群不断扩大,吸食合成毒品人员快速增长。^[35]可以说,近年来贩毒发案数量迅猛上升,案件破获难度大,非法运输制毒物品打击难,使得边境地区贩毒现象难以根除,^[36]从而给云南边疆安全和边境管控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刘璐指出,毒品问题导致大量社会财富的流失和部分群众生活极度困难,对边疆地区的社会生产方式构成严重破坏和冲击,^[37]它不仅造成边疆民族地区的劳动力流失,而且严重危害了地方社会秩序与边疆和谐稳定。

三是艾滋病问题。国内外的大量研究表明,由于流动人口自身的特殊性,他们往往成为易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高危人群。近年来,随着云南边境地区跨国人口流动现象的愈加频繁和毒品问题的出现,云南省艾滋病从边境传入境内的现象更为突出,中缅边境地区成为云南省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主要地区。王璐等人曾专门针对云南地区艾滋病感染状况做了调查,指出

云南省与缅甸、越南等国接壤地区系少数民族聚居地，人口多且跨国人员往来十分频繁，毒品走私、交易猖獗，是我国艾滋病流行、扩散的隐患。^[38]莫国芳等人通过对云南跨国流动人口与艾滋病扩散的研究指出，流动人口对感染 HIV 病毒的危险行为和预防方法知晓率较低，是艾滋病的易感染人群，是艾滋病毒向一般群体传播的主要媒介。^[39]由于流动人口主要以青壮年人口为主体，同时又由于脱离了家庭和社区环境，自我约束能力减弱，成为易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一旦成为艾滋病毒携带者，则有可能通过流动行为将艾滋病毒进一步传播开来。^[40]

四、跨国人口流动服务管理的对策研究

云南边境地区涌入我国境内的外籍人员不断增多以及跨国流动现象的频繁，给我国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和边疆社会治理带来了严峻的考验。何跃认为，云南边境地区边民出入境管理中还存在边境管理制度不统一、边民的国家观念和国界观念以及依法持证出入境的法制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三非”人员屡禁不止、对外籍人员的管理政策和法规相对滞后等问题。^[21]张爱华通过对中缅边境地区的实证研究指出，中缅边境云南段外籍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主要存在部分外籍流动人口国籍身份难以认定、“三非”外国人存在、基层公安派出所外籍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滞后以及在华外国人服务管理法规相对不够完善等突出问题。^[30]总之，对于云南边境地区跨国人口流动的管理问题而言，既存在地缘国家管理制度不统一和出入境政策调整等主观问题，也存在边境地区境外边民国籍身份难以认定以及外籍“三非”人员大量存在等客观问题。

针对云南边境地区的跨国人口流动现象及其影响，学界围绕如何消解边境多民族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保证边境地区的和谐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第一，加强边境地区跨国人口流动治理研究。针对跨国人口流动这一影响云南边境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很多学者指出了目前出入境管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罗刚认为，目前我国关于边境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及现行边境管理制度存在诸多不足，因此必须从法治的角度尽快完善相应对策，并通过加强与邻国的合作、完善法律法规、理顺出入境管理机构、加大处罚力度等措施切实维护边疆稳定。^[41]梅新育也指出，在制定人口、教育、民族、宗教、城市发展等政策时，必须将跨国人口流动的因素及其长远影响纳入考虑。^[42]谷家荣通过对中越边民跨国流动的实证研究指出，滇越边民基于血缘关系的频繁往来，影响着国家疆域的巩固和边疆民族社会秩序的稳定，维护滇越边境稳定的关键在于国家、地方和边民三者之间构筑起一个有序的会通和并接环境。^[43]

第二，加强外籍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研究。黄彩文通过对中缅边境地区外籍劳务人员的研究提出，努力实现信息共享、积极建立联动机制、着力构建培训体系、不断探索管理模式、深入推进边疆治理，成为应对大量缅籍劳务人员跨国流动带来的现实挑战，维护中缅边疆和谐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的有效路径。^[13]张爱华也提出要积极推进外籍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例如，要指导基层派出所民警做好居住在辖区内的外籍流动人口住宿信息采集、登记和录入管理工作；对民警进行证件识别、出入境管理系统住宿登记信息录入的培训，加强临时来华住宿登记管理，切实提高派出所实有人口管理的水平。^[30]何跃提出，在对疆境外流动人口实施区域化管理中，必须认清对西南疆境外流动人口管理的艰巨性，通过境外流动人口区域化管理机制的建立和深化来带动整个公安出入境现代警务机制的建设，尽可能减少境外流动人口对西南边疆安全环境的危害。^[23]

第三，加强边境地区跨国非法移民治理研究。张家忠指出，加强对中缅边境地区外籍流动人员的服务管理工作，首先要明确公安机关在中缅边境地区外籍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中的定位；其次要强化外籍流动人口的管控工作，提高发现、预防、控制“三非”及其违法犯罪活动能力；最后要创新外籍人员服务模式。^[24]张志远通过对云南沿边州市跨国非法移民的实地调研，分析了跨国非法移民及相关问题，提出“身治”与“心治”相结合的跨国非法移民治理模式，探讨地缘政治、边疆政治、国家安全和民族关系作为提升跨国非法移民治理的路径。面对中缅边境地区非法出入境现象严重的形势，郭瑞提出要从发挥公安边防部队职能、加大科技投入、完善协作机制、完善立法及强化宣传教育等方面，不断加强边境地区的管控力度，遏制非法出入境活动。^[45]石晨炜也提出应该通过引入科技手段、实现片状管理、细化法律法规、加强与缅甸边防部门的合作等方式，有效打击偷越国境的违法犯罪行为。^[46]

五、关于边境地区跨国人口流动研究的思考

综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云南边境地区跨国人口流动与边疆稳定问题开始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并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为我们了解边境地区跨国人口流动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但目前的研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一是宏观研究多,而深入扎实的个案研究和创新性研究成果少;二是对长期生活在云南边境地区的外籍穆斯林群体的研究薄弱;三是对近年来云南边境地区出现的“回流边民”现象关注不够。因此,笔者认为,我们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云南边境地区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以及近年来的新趋势、新特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跨国人口流动的调查研究,为党和政府进一步加强边境地区事务管理、维护边疆和谐稳定提供决策参考。

一是要重视和加强我国与东南亚邻国跨国流动人口有效管理的合作机制研究。针对边境地区跨国人口流动日益频繁、流动人口数量日益增多和“三非”人员屡禁不止的趋势,如何进一步加强与缅甸、越南和老挝等东南亚邻国政府层面的沟通,建立健全跨国流动人口有效管理的合作机制,同时积极开展深入的实证研究,为政府部门妥善处理这一问题提出更具操作性的对策措施。

二是要重视和加强边境地区外籍特殊群体的研究。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云南边境地区既是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和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前沿阵地,也成为境外敌对势力进行宗教渗透和分裂活动的重点区域。^[6]近年来,大量外籍人员不断涌入云南边境地区经商、务工,从而给地方社会管理带来潜在的威胁。因此,如何加强特殊群体的宗教信仰管理,谨防宗教渗透等问题需要引起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关注。

三是要重视和加强边境地区外籍人员的社会文化适应研究。大量外籍人员进入我国边境地区务工、经商或者婚嫁到我国后,由于存在着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以及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必然要面临社会融入和文化适应等问题,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薄弱。因此,重视和加强对外籍人员的社会文化适应问题研究,不仅有利于维护边疆社会稳定,而且有利于促进我国与越南、老挝、缅甸等东南亚邻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为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做出应有的贡献。

四是要重视和加强边境地区“回流边民”的调查研究。“回流边民”是近年来云南边境地区出现的一种特殊的跨国人口流动现象,主要指云南边境地区历史上部分边民由于各种原因迁移到缅甸、越南、老挝等国家生活,近年来又陆续回迁中国边境地区定居的现象,其中尤其以中缅边境地区较为突出。由于这部分人群外流及回迁历史背景复杂而特殊,且无中国国籍,加之云南边境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复杂的人文环境和重大的国防意义,^[47]因此给地方社会治理和边疆安全带来了诸多严峻挑战。如何在开展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有效解决诸如此类历史遗留问题的对策建议,是需要今后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总之,人口的跨国流动既给云南边境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接触、对话、交汇、互融,思想的碰撞与交锋等,^[48]也给当地的社会秩序和边疆治理带来巨大的挑战与考验。如何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做好跨国人口流动的服务管理工作,维护边疆和谐稳定,仍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进一步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

[参考文献]:

[1]鲁刚.中缅边境沿线地区的跨国人口流动[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2]卢鹏.滇越边民跨境流动及其特征——基于“江外三猛屯方”哈尼族的实证研究[J].红河学院学报,2013,(5).

[3]鲁刚,等.社会和谐与边疆稳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4]保跃平.选择与困境:云南边境跨国婚姻的社会学分析[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

-
- [5]周雷. 点击边境“跨国互动”[J]. 瞭望, 2007, (31).
- [6]黄彩文, 黄昕莹. 中緬边境地区布朗族的宗教文化交流与国家安全[J]. 大理学院学报, 2014, (7).
- [7]莫力. 跨国族内婚中“缅甸媳妇”的社会文化适应——以中緬边境云南盈江傣族、景颇族两寨为例[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5).
- [8]马健雄. 性别比、婚姻挤压与妇女迁移——以拉祜族和佤族之例看少数民族妇女的婚姻迁移问题[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4).
- [9]戴长征, 乔旋. 跨国人口流动的原因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J]. 教学与研究, 2009, (1).
- [10]张志伟, 胡石清. 我国人口流动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6).
- [11]张金鹏, 保跃平.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跨境婚姻与社会稳定研究[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1).
- [12]张家忠. 瑞丽市外籍流动人口的特点[J].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2014, (1).
- [13]黄彩文, 和光翰. 中緬边境地区外籍劳务人员与边疆安全[J]. 学术探索, 2016, (8).
- [14]何跃. 云南边境地区主要贸易口岸的境外流动人口与边疆安全[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2).
- [15]何明. 边疆特征论[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1).
- [16]梁淑英. 非法移民的处理措施[J]. 太平洋学报, 2007, (7).
- [17]白庆哲, 阮征宇. 浅析跨国人口迁移的现实动因[J]. 学术论坛, 2004, (6).
- [18]陆云. 当前中緬边境地区非传统安全突出问题与应对策略[J]. 学术探索, 2012, (12).
- [19]陈德顺, 普春梅. 境外流动人口对云南边境地区社会治理的影响与对策[J]. 社会学评论, 2014, (4).
- [20]陈真波. 西南边境地区跨国流动人口的现状与问题[J]. 贵阳学院学报, 2010, (1).
- [21]何跃. 云南境内的外国流动人口态势与边疆社会问题探析[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1).
- [22]何明. 开放、和谐与族群跨国互动——以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国家边民跨国流动为中心的讨论[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1).
- [23]王晓丹.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中女性婚姻迁移的原因和影响——以云南省文山州为例[J].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11, (8).
- [24]张家忠, 章春明. 创新中緬边境外籍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路径分析——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J]. 云南警官学院学报, 2014, (1).

-
- [25]张振伟. 中缅边境勐龙镇缅甸籍劳动力跨境流动与身份认同[A]. 跨境民族研究(第二辑)[C].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6.
- [26]李光灿, 沈淑珍. 论边境开放口岸流动人口的作用及其管理[J]. 人口学刊, 1994, (3).
- [27]杜彬. 中缅边境地区“三非”问题的原因及对策[J].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3, (5).
- [28]李玉洁. 德宏边境地区“三非”外国人现状的思考与对策[J]. 云南警官学院学报, 2012, (5).
- [29]吴喜. 中缅边境地区云南段“三非”人员管理及应对[J]. 云南警官学院学报, 2013, (5).
- [30]张爱华. 浅析滇缅边境地区非法居留问题——以德宏边境地区边民入境通婚为视角[J]. 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3, (6).
- [31]张洁. 边境地区“三非”人员跨境违法犯罪问题研究——以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J]. 云南警官学院学报, 2014, (2).
- [32]杜万鞭. 论“三非”问题综合治理的对策[J]. 云南警官学院学报, 2013, (2).
- [33]李光灿, 马光中. 云南边境地区的人口流动与毒品犯罪[J]. 人口与经济, 1998, (4).
- [34]方天建, 何跃. 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云南跨界民族毒品问题[J].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2016, (1).
- [35]陆云. 当前中缅边境地区非传统安全突出问题与应对策略[J]. 学术探索, 2012, (12).
- [36]程喜. 云南中缅边境打击走私制毒物品战略及对策[J]. 云南警官学院学报, 2011, (6).
- [37]刘璐, 罗圣荣. “金三角”毒情的走势及其对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J]. 保山学院学报, 2010, (6).
- [38]王璐, 等. 云南省跨境人口艾滋病病毒感染状况及影响因素调查[J].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2010, (10).
- [39]莫国芳, 等. 云南流动人口与艾滋病扩散[J]. 人口与经济, 2004, (2).
- [40]罗淳, 等. 跨境人口流动的艾滋传播风险及其防范——基于云南边境口岸调研问卷的实证分析[J].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4).
- [41]罗刚. 云南边境民族地区非法人口流动法治对策研究[J]. 河北法学, 2011, (9).
- [42]梅新育. 当前我国跨境人口流动的风险与挑战[J]. 人民论坛, 2014, (16).
- [43]谷家荣. 滇越边民跨国流动与社会稳定研究——基于国家、地方与边民的视角[J]. 广西民族研究, 2011, (2).
- [44]张志远. 云南及周边国家跨国非法移民的治理[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7, (4).

[45]郭瑞, 马长泉. 中缅边境地区云南段非法出入境治理研究[J]. 云南警官学院学报, 2016, (5).

[46]石晨炜, 徐祗朋. 浅析瑞丽段中缅边民偷越国境问题[J]. 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4, (2).

[47]尤伟琼. 中缅边境地区中国外流边民回迁现象研究——以中缅边境地区怒江段为中心[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1).

[48]范可. 流动性与风险: 当下人类学的课题[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5).